

## 历史回顾



斯尔维亚·纳萨尔

### 伟大的追求

经济学天才传记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纽约，2011年，558页，35美元（精装）。

在《美丽心灵》这部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传记中，西尔维娅·纳萨尔实现了生活与思想的完美统一，也研究了一个天才脆弱的本质。《伟大的追求》这部书是通过群体传记的方式讲述知识历史的，但没有《美丽心灵》成功。纳萨尔讲述了十几个经济学天才的故事，从卡尔·马克思到保罗·萨缪尔森和阿玛蒂亚·森。她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时代特点”进行了描述，并清晰而准确的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但是这本书涉及的面太大，节奏太过紧张，让人无法把主要的观点合理地统一起来。他们的生活、时代以及想法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人为凑成的，纳萨尔没有将总结概括化，而这些总结有助于阐明问题。此外，还有些环节被漏掉了：例如克努特·维克塞尔和瑞典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阅读本书似乎像经历了一次知识性、历史性的

旅行。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有趣，但并没有《美丽心灵》运用的模式成功。

这本书的书名实际上是受到了“人类可以经济需求方面扭转局面，掌握经济规律，控制物质条件，而不是被物质环境所奴役”的启发。正如纳萨尔所说的，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将人们从贫穷中解放出来。从一开始就存在空想社会改良元素，但是这个年代更需要科学基础而不是神学基础（本书中，纳萨尔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描述的早期经济学家的数量上，包括欧文·费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文书背景的琼·罗宾逊）。

纳萨尔一个含蓄的观点是经济学的进步直接导致了物质条件的

### 虽然经历了这次大衰退及其后续影响，但纳萨尔依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

改善。经济学分类中，她最感兴趣的是自由经济还是政府行为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后一种想法的代表，碧翠斯·韦伯应该被包括在内，碧翠斯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即使在经济学家涵盖的范围较广的19世纪也是如此。

纳萨尔描述的那个时代的中心特点是商业周期。那些伟大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正是他们所持的经济学观点。在这本书的描述中，约瑟夫·熊彼特是个充满个人魅力的英雄，认为衰退是进步必需经历的一个部分，应该忍受。弗里德曼·海耶克认为衰退并不是必需的，但应该忍受。凯恩斯则认为衰退既不是必需的，也不应忍受。

这个分类中，凯恩斯的观点最接近费雪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认为合适的货币政策既可以预防衰退，也可以治愈衰退。但凯恩斯认为仅仅货币政策还不够，财政政策也是必要的。

如果凯恩斯、费雪和弗里德曼对待上述问题上的观点属于同一类经济学家，在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问题上，凯恩斯和海耶克也属于同一类。这源于他们对“完善信息”假设的摒弃。熊彼特所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他在其他问题上也持不同看法一样。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式的英雄人物”是推动进步的主体，正如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引擎。但是他一直认为经济学可以像物理学一样成为一门严密的自然科学，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学习他一直没有掌握的数学。

虽然经历了这次大衰退及其后续影响，但纳萨尔依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金融危机暴露了想象中的风险管理原来是自欺欺人的，无论是政治家、银行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是如此。但导致这次危机的错误思想的根源可以在《伟大的追求》描述的发展历程中找到。其中纳萨尔所选的一个天才就是保罗·萨缪尔森，其所著的《经济分析基础》在过去50年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建立模型，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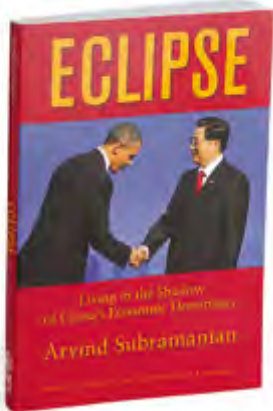
纳萨尔通过讲述这些名人传记事例，反对“数学可能会使其他语言萎缩的担忧”，并指出萨缪尔森的“语言艺术”、约翰·冯·诺依曼的“从狄更斯那里引用了逐字翻译”的能力。但她应明白，这并不是关键所在。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Robert Skidelsky)

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 在烈日的照射下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 日食

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生活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2011年，216页，21.95美元（简装）。

这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册子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比现在所公认的要更进一步，基础更加广泛，包括产出、贸易和货币等方面”。作者在反思中国是否会放弃重商主义，成为自由贸易的老大，让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储备货币，提倡多边主义，并将其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的最佳途径。作者认为在保持中国经济实力可控制性并建设性地对其进行疏导方面，世贸组织比IMF更为有效，他认为现在应放弃“多哈回合”，开始“中国回合”谈判。正如1973—1979年的“东京回合”一样，当时日本经济正是经济发展的前沿和中心，“中国回合”谈判会将中国置于稳定的多边体系中。

这本书是由经济学家所著，但目标读者群非常广泛。该书以事实为基础，本质上富有技术含量，并加以大量细腻的分析。作者没有深度评估随着中国国内对这种中国主导言论的抵制，中国的主导经济实力会如何。如中国专家所了解的，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果这本书将来再版的话，可能会分析2030年中国的全球经济实力与19世纪70年代美国以及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的全球经济实力有何不同。但只有中国真正重视民主，才会对世界其他各国具有吸引力，也会增强其软实力。这本书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及世界其他各国，尤其是现在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此书也没有就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不开放或美国没有按时对国内经济和财政进行必要调整等可能

## 风云十年

詹姆斯·鲍顿

### 《拆掉围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0—1999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2012年，92页，90美元（精装）。

这本书是该系列中的第5册，詹姆斯·鲍顿以一个学者的风格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IMF完整的历史，其中有些片段出人意料。《拆掉围墙》是这个系列的有益补充，此系列还包括鲍顿的《安静的革命》，描写的是1979—1989年发生的故事。

对于研究专家来说，《拆掉围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IMF指南，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可以开阔视野，对IMF有一个整体了解。对IMF员工来说，要了解自己所在机构的发展历程，这本书也是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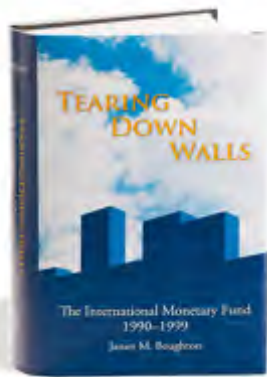
好的资源。

但是由于读者范围广，需求各有不同，有的需要其像百科全书一样的包括方方面面的介绍，有的则需要对重要主题有所侧重。这种题目一般本质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如鲍顿记述IMF在东欧及前苏联的活动时，对前苏联每一个经济体都进行了历史描述，而这并不是那么方便阅读。

作者主要以IMF的档案为记述基础，通过开放的途径及人物采访等完成本书。但是人们想知道这些记述有多少是鲍顿采访对象对这些事件的真实看法，有多少是那些采访对象现在所希望的。

米歇尔·康德苏时任IMF总裁，他在书中被塑造为充满活力、理想远大、不惜牺牲个人名誉的人。康德苏的那位孜孜不倦的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被塑造为当时在危机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人。

但是，除这些人物，其他个人



在整个历史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小。也许对于IMF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官僚政治限制了个人发挥的空间，因此鲍顿对这些人物的强调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真是这样，作者可能会对那些官僚密谋评论更多。

我们听到的各“地区”部门（其对各自负责监测的国家相对而言更为同情）与诸如负责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职能”部门（其一般更为苛刻）之间相互斗争很少。IMF内部一些部门对于接受新观念的没有开放的态度，这是人人皆知的。而职能部门恰恰就是在问题时期人们所

出现的危机，提出应对策略。

我对本书的方法论及一些观点有些质疑，但对大多数结论表示同意，并相信应严肃对待本书所传达的核心信息。中国在一些方面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其经济的快速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对国际需求及商品市场的影响力要大于美国，尽管美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依然是中国的两倍多。当衡量美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影响力时，GDP规模（即使调整为购买力平价）并没有增长速度重要。另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将贸易作为一国经济实力的决定因素。正如该书作者所预计的，中国的贸易规模确实庞大，且到2030年时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例会上升至15%（相对于2010年的9.8%来说）。但中国的加工贸易（其所带来的国

内附加值极低）占总贸易额的比例在未来20年内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计算全球经济实力时，加工贸易应与标准贸易所占权重同等吗？我不这么认为。

作者预言中国会开放本国金融管制（人为压低利率及汇率低估），并发展成全球自由贸易的排头兵，以提升本国利益，这个肯定的结论是有争议的。作者根据中国现在努力推动本币国际化，判断中国会取消所有资本管制并推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虽然逻辑清晰，但现实吗？我表示怀疑。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内政治影响力非同小可。金融管制是中国政治体制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核心，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让我们共同希望作者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因为结束金融管制、将人民币发展为

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货币是符合中国（及世界）的长期利益的。

彼得·鲍泰利  
(Pieter Bottelie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高级客座教授，曾撰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

说的这类部门，它们被称为思想警察，当然是一个负面称呼。这是读者希望了解的。

《拆掉围墙》让人联想到柏林墙的倒塌，或前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本书引导读者了解IMF如何通过努力提高透明度——拆掉将这个机构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本书还提及了全球化进程中，IMF的角色依然是充满争议的。

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东欧及前苏联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鲍顿将IMF塑造为推动这一进程付出积极努力的适合的机构。基金组织在帮助各国调整宏观经济及结构不平衡方面非常专业，而当时前苏联经济体恰好存在宏观经济及结构强烈不平衡的问题。

但并非所有IMF职员都是了解前苏联的经济学家，这些前苏联国家在围墙倒塌之前并不是IMF的成员国。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是宏观经济平衡较没有存在过的地区建立市场更难恢复，还有如何管理

大规模私有化。IMF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例如，鲍顿自己提出，基金组织面对私有化问题时屡次迷茫。

本书接着记述了墨西哥、俄罗斯及亚洲金融危机。这些章节有广泛的分析，此外鲍顿对这几次危机的内幕有所揭示。如，我们了解到IMF最早得知墨西哥比索即将贬值的消息并不是通过墨西哥政府，而是通过一个美国政府高官不假思索的话语。我们还了解到IMF没有继续努力阻止俄罗斯违约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正在法国巴约讷度假的康德苏与基金组织驻墨西哥的职员约翰·欧德玲—斯密间的一个误传误解的通话。

这个情节有些地方扣人心弦。读者会对凌晨两点的几次紧急电话留下深刻印象，也会记住IMF官员如何频繁的穿梭于莫斯科与雅加达之间，以挽救世界经济坠入深渊。

鲍顿将1995年、1997年及1998年世界经济情况描述得就如

“雷曼兄弟”垮掉一样近在眼前。回顾20世纪9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非常容易坍塌。人们会问为什么IMF那时不作出更多努力以纠正这些问题。

最后，有些问题在本书中只是一笔带过，如中国、印度、全球失衡、美元的国际角色、欧元的出现。无疑，这些主题是本系列下一本书的中心问题，但也反映出其在这本书中不是主要问题。书中揭示了IMF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也是一个应对机构。其实质是对刚刚过去的问题作出反应，而不是预见新问题。

巴瑞·艾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与政治科学George C. Pardee和Helen N. Pardee教授、IMF前高级政策顾问（1997—1998年）